

中国—东盟研究回顾与展望(上)



作者：许利平

2021年为中国—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。在这30年中，双边关系从对话关系、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，一步一个台阶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，但中国—东盟贸易和投资双向逆势上扬。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这体现出中国—东盟合作中的强大内生动力。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—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，“中国—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，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”。

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为更好推动中国—东盟关系向前发展，有必要回顾中国—东盟研究，总结国内外学术界、智库等对中国—东盟研究的重点、亮点与难点，同时展望未来中国—东盟研究，以期使国内外中国—东

盟研究更符合时代需要，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。

中国视角：历史悠久 成果丰硕

中国的中国—东盟研究起源于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。在1967年东盟成立前，中国就开展了对这一关系的研究，可以说是历史悠久、成果丰硕，成为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航者。

古籍资料丰富，为全球东南亚研究的独特优势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交往源远流长，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。中国的使者或僧人出访东南亚，撰写了大量关于当时东南亚风土人情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典籍，成为全球研究古代东南亚难得的资料。在古代，东南亚曾被称为南海、南洋等，而扶南、真

纳、三佛齐等则为当时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称呼，许多典籍大都以上述名称记载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历史风貌。

据相关记载，230年左右，东吴孙权曾经派遣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诸国，并在那里居住多年。二人回国后撰写了《吴时外国传》和《扶南异物志》两本专著，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东南亚诸国的状况。由于时间久远，两本专著今已遗失，但部分章节保存于《太平通览》和《通典》等古籍中。

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大批僧侣西去印度研究佛经，中途停留东南亚，撰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南亚的专著。东晋的法显，于399年3月由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。他去途为陆路，回国则走水路，搭乘商船途经东南亚，停

留多年。他413年回国，并撰写《佛国记》，又名《法显传》《佛游天竺记》，该专著成为研究东南亚、南亚的珍贵史料。

唐代高僧义净，于671年从广州取海道赴印度求法，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10年，后取海路回国，在东南亚一带滞留10年，于695年回到中国。后撰写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四卷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两卷，该书是义净根据自己所见所闻，对当时的印度、东南亚以及中国佛教的真实记录。

宋代时期，三佛齐（又称室利佛逝）曾派遣使者访问中国约36次，《宋史·外国列传》对此有记载。此后，比较系统研究东南亚国家的专著还有元代周达观的《真腊风土记》、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等。

明朝时期，郑和七次下西洋，出访东南亚多地，其部属马欢所著《瀛涯胜览》对当时爪哇等地进行了详细描述。

华侨华人研究，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特色。华人移居东南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，后来经过几次移民浪潮，逐渐在东南亚形成华侨华人群体，甚至出现了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5%以上。他们在东南亚的经济、社

会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起始阶段。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，中国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，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史，其中华侨华人研究成重要方向。1904年，梁启超发表《记华工禁约》，为华侨史的开篇之作。1905年，他又发表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，属于一部华侨史人物专著。另外，羲皇正胤的《南洋华侨史略》为中国第一部华侨史专著。20世纪20—30年代，一批华侨史著作相继问世，1928年李长傅的《南洋华侨史》和1929年温雄飞的《南洋华侨通史》为当时华侨史的代表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学界仍然把华侨华人研究作为研究东南亚的重要方向。陈翰笙主编的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》（共十辑），其中第五辑“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”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华工的丰富文献资料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吴凤斌等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归国华工的农场中开始田野调查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呈现规模化、规范化趋势。首先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，研究阵地不断增多。其次，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，逐步



印尼东爪哇省省会泗水的郑和清真寺。(管克江摄)